

黃仁宇筆下的萬曆十五年，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一年」。對於新中國來說，2012年必定是「頗為緊要的一年」。在這一年，諸多關涉到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大事件登上了歷史的舞台，諸如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召開、薄熙來的下台與「重慶模式」的轟然倒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發文學與政治關係的海內外大爭論、釣魚島事件與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勃發、什邡事件與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前景、倫敦奧運會與舉國體制的存廢等。無論是如史家般如實記載，還是如社會科學家般深刻剖析，歡迎海內外作者踴躍賜稿。

——編者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敗」與「成」

任劍濤在〈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宿命〉（《二十一世紀》2012年10月號）一文中認為，蘇東國家在「政治體制結構絕對不變」的前提下採取功能性的調適改革路徑，無法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最終導致改革失敗，甚至國家的崩潰，而任先生關於「政改不應預設政治前提」和「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為表徵的國家結構應為現代國家結構建設之方向」的建議，對當下的中國政改也富啟示意義！

不過，在評判一個國家改革的成敗時，我們能否僅憑官方國家建設上的「失敗」，就判定該國奠基於該「失敗」的「社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會政治改革」也是失敗的？「蘇東劇變」前後的社會現狀告訴我們，包括「官方政治改革」之「社會政治改革」的主體並不是官方政治精英，而是社會大眾，儘管官方（抑或「在野」）政治精英是「社會政治改革」的主導者。因而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成功與否，不僅要看官方改革目標達到與否，更要看社會大眾是否覺得「改革」後的生活優於往昔。如果蘇東人民覺得「蘇東劇變」後的生活更美好，那麼蘇東改革便是成功的，儘管「官方政治改革」遭遇了失敗。

因此，我們對「國家改革」的理解不能局限於「官方政治改革」層面，而應擴展至「社會政治改革」層面；並且所有意識形態標籤都不應成為人們追求幸福的障礙！

姚選民 長沙

2012.10.19

政治視角下的民族關係

嚴耕望先生曾謂「治史最為吃力」，「因為歷史牽涉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當博通，就不可能專而能精。」迪娜古麗在〈族群、政治與婚姻——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的維吾爾族婦女（1954-1975）〉（《二十一世紀》2012年10月號）一文中，雖以1954到1975年新疆建設兵團中的維族婦女為主題，但實際上牽涉到此段時期社會的各個方面：中共的民族政策、軍事與國防、宗教與革命、生產與勞作、身份與認同、愛情與婚姻、邊疆與內地等。

該文結合口述史及兵團檔案資料，對兵團婦女的勞作生活、婚姻情況均有較為深入的描繪與闡述，頗為不易。作者最後指出，在毛時代新疆民族矛盾比較緩和，主要是因為「兵團在經濟層面存在着對地方的積極影響」。這樣，該文業已超出一般的性別史或邊疆研究，且實際上跳不出當前研究新疆時的問題與框架：即政治視角下的民族關係。

頗為可惜的是，該文第一部分只以兵團中的婦女為主體，並未集中於維族婦女身上；第二部分的後一部分內容才以維族婦女的婚姻為討論對象。若能以相關檔案資料為基礎，結合口述史，集中於兵團維族婦女的勞作、生活、愛情、婚姻、家庭、身份、認同等主題，關注普通維族婦女在特殊時代的歷史機遇，並以此折射

毛時代新疆的民族關係，或可使該文更富學術與現實意義。

肖清和 上海
2012.11.2

於傳統文化的視角中，才能獲得合理的認識。

張建 上海
2012.10.23

表達與實踐背離？

通過對當代中國福利制度的形成原因與實踐予以檢討和分析，鄭廣懷在〈安撫型國家的形成——對中國社會福利體制的新制度主義批判〉（《二十一世紀》2012年10月號）一文中提出了「安撫型國家」的概念，同時指出了其特點。

鄭廣懷的安撫型國家、福利制度表達與實踐背離等觀點，都極有洞見。以此邏輯觀察下去，我們會發現不僅是福利制度，而是當代中國的大多數制度都處於表達與實踐的相互背離之中。這一背離產生的原因就在於：在制度的建構上需要解決合法性問題，同時在制度的實踐中又需要解決有效性問題，這一雙重要求對後發型、歷時性問題與共時性問題共存的當代中國來說，無疑有着不可調和的衝突和矛盾。

但對當代中國（包括福利制度）的制度表達和實踐的觀察與重構，又不能僅限於用西方的理論作為唯一標竿來衡量。我們應該做的是：反思和總結這些現象背後的邏輯一致性問題。例如，基層政府與普通公民發生糾紛之時，經常訴諸於法院，但在訴訟／調解過程中，又喜與對方當事人進行協商。顯然，這是法治型與治理型兩種司法話語邏輯之中的任何一種都無法加以解釋的：既挾裹法治的外衣，同時又內含治理的邏輯。這只有將其置

戰略抑或是策略？

高王凌〈中國共產黨為甚麼放棄新民主主義？〉（《二十一世紀》2012年10月號）一文的分析與論證，對於一些問題的解釋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其一，高文提到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邏輯促動的影響，但缺乏對新民主主義理論本身缺陷的研究。至今我們對於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認識，主要還是根據當時有關領導人的講話，但新民主主義理論對社會性質、主要矛盾、國家制度建設等問題的解釋，也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

其二，高文主要從國內現實層面來分析中共政策所受的影響，而忽視了對毛澤東個人因素的考慮。作者認為形勢與力量對比消長的變化才是中共政策轉變的最主要原因。但當時中共黨內並不是鐵板一塊，中共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毛的態度是最為重要的。真正影響毛放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關鍵性因素是甚麼？其思想如何轉變？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其三，高文對於國際因素的分析也有些泛泛而談，難以令人信服。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作者欠缺就蘇共對中共壓力影響的分析，蘇聯到底是如何迫使中共放棄自己的政治綱領？中共又是如何應對的？這些問題都缺乏實證性的研究。

劉岩 南京
2012.10.19

請回歸現實

李敏剛、周保松在〈社會主義有道德生命力嗎？〉（《二十一世紀》2012年10月號）一文中採取的論述策略是：第一，以科恩（G. A. Cohen）為論述中心；第二，從社會主義的政治道德的角度切入，也就是將問題轉化為「為甚麼它較自由主義更能實現自由、平等、社群、正義這些受到廣泛認同的價值？」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在今日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低潮時期，社會主義如何進行理論上的論證和推進？這些工作可以在很多方面展開，其一就是要說明：「為甚麼它較自由主義更能實現自由、平等、社群、正義這些受到廣泛認同的價值？」可惜作者在考察後發現，雖然科恩試圖「建構出一套重視平等與社群的社會主義道德觀」，但是其內涵「和當代自由主義的主張並沒有太大分別」，換言之，科恩的努力失敗了。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中揭示了「自由」和「平等」之間的衝突。當今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爭難道不是在「自由」和「社群」兩個價值之間作出選擇？與其進行理論上的推演，不如進行實證性調查。筆者認為「今天的中國」的實踐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只是我們的理論反思沒有跟進。

蔡志棟 上海
2012.10.21